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南北对立与郭璞的《江赋》

赵沛霖

(天津社会科学院, 天津 300191)

摘要: 两晋之交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南北对立的特定背景,使本来属于自然地理范畴的长江,不但一跃成为关系到东晋王朝前途和命运的生命线,而且成为现实性很强的文学题材,寄托着包括作者在内的“过江诸人”的诸多情志和愿望。《江赋》塑造的长江艺术想像,不但真实生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且以富于阳刚之美的浩瀚、雄奇和壮阔特征充分展示了长江独特的精神气质和强大的内在生命力。在胡马临江、社稷倾危、朝纲不振、士臣悲观失望、民族生死存亡命悬一线的“最危险的时候”,作者满怀激情地讴歌长江、赞美长江,并在此基础上抒写对东晋君臣践行他思想主张的殷切希望,无疑对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衷共济、渡江北伐、洗刷民族耻辱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思想主张虽然未能完全达到艺术上的有机统一,但在政治上却实实在在地地点到了东晋王朝虚弱病体的穴位。

关键词: 郭璞《江赋》; 长江; 两晋之交; 南北对立

以全面铺写和赞美长江为中心内容的《江赋》,是郭璞辞赋创作中一篇最为重要的作品,也是两晋辞赋中的重要作品之一。之所以这样说,固然与它的富有骨力和美感特征的艺术描写有直接关系,但最为主要的原因却不在此,而在于其题材的现实性。原来,在两晋之交的特定历史语境中,长江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强烈现实性的题材,特别是对于那些“过江诸人”来说尤其如此。这是因为两晋之交这段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惨烈历史,使本来属于自然地理范畴的长江一跃成为东晋王朝的生命线,而被寄托着包括作者在内的“过江诸人”的诸多情志和愿望。就是说,长江对于东晋社会来说,已经具有了全新的意义,在人们心中的重要性和地位因而得以空前提升。对于长江的这种鲜活认识和感受,由于源自人们亲身经

历的那段惨烈历史(为数众多的“过江诸人”都是那段惨烈历史的亲历者和蒙难者,详后)而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迫切性,因此萌生于心就必欲吐之而后快。

《江赋》题材和内容的这一特点,决定了要正确把握它必须首先搞清楚它的问世与时代历史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必须深入东晋社会的现实生活去寻绎作者写这篇大赋的深刻原因。一般说来,一个作家写什么不写什么,并非偶然,而总有其内在的原因,特别是在事关民族历史命运、个人前途和身家性命的历史紧急关头,尤其如此。生当两晋之交,经历了“永嘉之乱”的民族历史悲剧的郭璞,恰恰就生活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他以长江为题材创作《江赋》绝非偶然。

按照习惯,如果要进行归类,那么《江赋》无

收稿日期: 2013-10-10

作者简介: 赵沛霖,男,天津人,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疑当属体物大赋一类。表面看来,尽管它没有完全摆脱追求繁复、夸奇炫博、好用生僻怪字的赋家陋习,但它却以辞赋创作中一系列难得的优长,如选取的题材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对长江艺术形象的成功塑造以及思想内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等等,而使之既不同于夸张失实、劝百讽一的《子虚》、《上林》,也不同于铺张扬厉、润色鸿业的《两都》、《二京》,从而在辞赋园地中别树一帜。

一、《江赋》是历史上第一次南北对立 特定背景下的产物

西晋末期的“八王之乱”和随之而来的异族入侵,使北方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摆脱异族统治,躲避战乱和灾难,人们携家带口匆匆出走,逃亡之风迅速席卷广大北方地区,并最终形成了对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人口“大流动、大迁徙”。^①逃亡的人群,除少数人逃往东北和西北依托于当地的统治者之外,大多数人,特别是中上层士人则是向南渡过长江,到江东即江左一带,所谓“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②其次是到江汉一带。初期,“海内大乱,江东差安”,^③异族入侵和骚乱的范围还仅限于北方,而没有威胁到江南,所以,人们渡过长江到了江南便意味着摆脱了异族的铁蹄,获得了暂时的安全和稳定。

当然,人们不辞颠沛流离,千辛万苦奔向江南,除了生命财产安全的考虑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出于一种政治和民族感情的驱使。原来,就在中原大乱,万民逃亡,西晋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坐镇江北的琅琊王司马睿已经渡过长江移镇建邺,接着,又在西晋王朝灭亡的第二年即建武元年(317)在建邺赓继大统,正式建立了东晋王朝。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晋皇朝已是汉族政权的象征,北来侨姓只能在晋朝旗号下才能在江南立足,南方士族也只能在晋朝旗号下才能抗拒来自北方的各种势力”。^④这样看来,北方士人避地江南而依附于东晋王朝,实际也是寻找自己的政治和民族的归属。就这样,北方士人纷纷聚拢于建邺司马睿的麾下;为笼络人心,司马睿在丞相王导的辅佐下对这些“过江诸人”也尽量予以安顿和优抚。

西晋灭亡以后,异族入侵不断深入,很快向南

推进。胡马临江,对东晋王朝形成了巨大威胁。而当时“南北比较,经济、武备,北方远胜于南方”,^⑤所以,形势对东晋政权极为不利“季龙自率众南寇历阳,临江而旋,京师大震。”^⑥类似的情况多次出现。可以想像,如果不是长江天堑,东晋王朝的江南半壁山河早已被胡骑的铁蹄踏遍。事实上,对于刚刚建立且处于劣势的东晋政权来说,长江已经成为胡马难以逾越的万里长城。正如赋中所说“所以作限于华夷,壮天地之险介。”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东晋王朝得以延续,避地江南的士人得以生存,已经完全系于长江一线——历史就这样决定了长江真正成了东晋王朝的生命线。

除了南北形势和地理的原因之外,再看东晋王朝内部的情况。在社稷倾覆、江山残破、国脉动摇、全民逃亡的危急情况下仓促建立的东晋王朝,不但国力衰微不振,而且晋元帝司马睿在臣民中也没有什么威望,乃至朝纲废弛,君臣关系失统,“当厄运之极,臣节未立,匡救未举”。^⑦这对于一个王朝来说,形势是十分严峻的。与司马睿从北方同来的“北人”尚且如此,南方士族也就更不把他放在眼里,以致司马睿登基、王朝建立多日,南方士绅仍不前来朝见。这种情况使那些抱着恢复江山、实现一统理想来到江南的“过江诸人”大失所望。“桓彝初过江,见朝廷微弱,谓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来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将何以济!’”^⑧桓彝的牢骚很有代表性。另外,广为人知的“过江诸人”的新亭“相视流泪”和“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⑨的哀叹,更充分说明抱有悲观失望情绪的绝不仅仅是桓彝个人,而是弥漫在士人中的一种普遍的情绪。

就对这种现实情况的体验和认识之深刻和迫切来看,除了司马睿之外,大概没有人能够比得上饱受这场历史劫难之苦且有志于振兴邦国的那些“过江诸人”了。

事实上,作者郭璞正是这样的“过江诸人”之一。我们知道,“永嘉之乱”始自河东,所谓“怀惠之际,河东先扰”。^⑩而郭璞的家乡闻喜即在河东。所以,敏感的诗人很早就意识到即将大难临头,并开始“潜结姻昵及交游数十家”,历尽千辛万苦,渡过波涛汹涌的长江而“避地东南”。^⑪作者在《与王使君诗》中对这段梦魇般的痛苦经历的记述,不但简要概括了他在这场民族灾难中的不幸遭

遇,而且字里行间透露出他的独特感受(详后)。这说明,郭璞不但是这场民族大迁徙和历史大劫难的最早亲历者和见证者,而且也是饱受其煎熬的蒙难者。

郭璞过江之后,先后受到殷祐、王导的提携,任他们的参军,并通过王导的推介而为晋元帝所知。^⑫这篇《江赋》大约即作于这个时期,并立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作者因此也得到了元帝的赏识;而郭璞则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不失时机地多次上疏,竭尽全力为朝廷尽忠。与此同时,他也不断升迁,先后任著作佐郎、尚书郎,后因母亲去世而去职。

对于上面所说的两种情况,即东晋士人中广为弥漫的悲观失望情绪和皇威不振、朝纲废弛的情况,郭璞在这段时间里自有可靠的渠道可以得知。从《晋书》和《世说新语》的叙述可以知道,桓彝是满怀悲观失望情绪的“过江诸人”的代表人物之一,而他恰恰是郭璞十分要好的朋友“璞素与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妇间,便入。”^⑬两人关系之亲密竟到如此的程度,他的悲观失望情绪郭璞不可能不知道。关于皇威不振、朝纲废弛的情况,郭璞更为了解,他在给朝廷的上疏中多次表达了对王朝前途命运的忧虑(详后)。

为了改变东晋王朝面临的内外交困的严峻局面,怀有振兴邦国之志的士臣作了很多努力,例如王导为了改变皇帝“名论犹轻”、^⑭毫无威信的局面,经过精心策划,特地导演了一出为司马睿大扬皇威的政治戏剧,并取得了令南人“咸惊服,乃相率拜于道左”^⑮的如意效果,此后南人才“渐相崇奉”,局面开始逐渐改变。^⑯再有,面对满怀悲观失望情绪的“过江诸人”,王导的一番话更是令人警醒“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⑰

王导掷地有声的话语的历史针对性和巨大的激励性早已尽人皆知,其实,对于产生于同一历史背景下的《江赋》也应当作如是观。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在江山残破、生灵涂炭、皇权式微、朝纲不振、士臣悲观失望、不思作为的危难之际,作者以时空寥廓的视角塑造长江浩瀚、雄奇、壮阔的艺术形象,满怀激情地讴歌这条王朝生命线的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

总而言之,两晋之交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南北

对立的特定背景,使本来属于自然地理范畴的长江,不但一跃成为关系到东晋王朝前途和命运的生命线,而且成为现实性很强的文学题材,寄托着包括作者在内的“过江诸人”的诸多情志和愿望。

二、长江的艺术形象及其意义

《江赋》的篇幅比较长,但结构却很简单,全文由两大部分组成:

第一大部分(从开头到“寻风波以穷年”),是关于长江的艺术形象及其意义,包括两大段:第一大段(由开头到“乃湔涌而驾隈”),从地理、地貌的角度总写长江,是对长江源流地理历程和地貌特点的全面把握。具体又可以分为三小段:第一小段(从开头到“淙大壑与沃焦”)写长江从发源到入海的全程,具体刻画了长江网络群流、挟带万山、穿越华夏大地的景象;第二小段(从“若乃巴东之峡”到“礧礧磅礴”),立体地再现了长江三峡的图景;第三小段(从“若乃曾潭之府”到第一大部分结束),写与长江相连的“曾潭”和“灵湖”的景象。第二大段(从“鱼则江豚海獐”到“寻风波以穷年”),分别写江中的物产、神异怪物和沿岸的人文、自然风光。也可以分为三小段:第一小段(从“鱼则江豚海獐”到“鸳雏弄翮乎山东”),集中写长江中林林总总、不可胜数的物产;第二小段(从“因岐成渚”到“吸翠霞而夭矫”),写沿江的自然风光和神异灵迹;第三小段(从“若乃宇宙澄寂”到“寻风波以穷年”),写长江的人文景观——江上便捷的水路交通和江边芦人、渔子的简朴生活。

第二大部分(从“而乃域之以盘岩”到结尾),就长江话题抒写希望东晋君臣践行他所提出的思想主张。包括两段:第一段(从“而乃域之以盘岩”到“事不可穷之于笔”),总结全文并向皇帝司马睿提出如何为政治理国家;第二段(从“若乃岷精垂曜于东井”到结尾),通过发生在长江上的历史典故说明正是长江孕育了忠贞高洁、刚正不阿、视死如归、宁可殉节而死也绝不苟活的士不可辱的精神,^⑱并殷切希望东晋广大士臣努力践行这种崇高的道德精神。

先来考察第一大部分。本部分以长江作为表现对象,不仅再现了长江的外在形象,更凸显了长

江的内在精神气质、强大的内在生命力和集多种审美形态于一体的阳刚之美。正是外在形象与内在精神气质兼顾,形、神密切结合,使长江获得了永恒的艺术生命。

首先,作者从宇宙宏观的寥廓视角,以纵横的笔墨具体描写了作为华夏天然屏障的长江的整体面貌,凸显了长江一往无前、气吞万里的宏伟气魄。

作者在描写长江从发源到入海、穿越华夏大地的过程中,具体描写了其网络群流、挟带万山、冲击奔突、席卷天地、吐纳灵潮、鼓怒作涛的丰富而不平凡的壮阔历程。只此一点,就把长江特有的风貌和性格与其他万千江河溪流十分明显地区别开来。作者的传神描写,处处突出了长江艺术形象的这一特点:

聿经始于洛沫,拔万川乎巴梁。冲巫峡以迅激,跻江津而起涨。极泓量而海运,状滔天以淼茫。总括汉泗,兼包淮湘。并吞沅沔,汲引沮漳。源二分于崦嵫,流九派乎浔阳。鼓洪涛于赤岸,沦余波乎柴桑……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澎湃。搞汗六州之城,经营炎景之外。所以作限于华夷,壮天地之险介。呼吸万里,吐纳灵潮。自然往复,或夕或朝。激逸势以前驱,乃鼓怒而作涛……协灵通气,湊搏相陶。流风蒸雷,腾虹扬霄。出信阳而长迈,淙大壑与沃焦。

在这段对万里长江鸟瞰式的全景描绘中,使用了一系列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词语,例如“拔万川”、“冲巫峡”、“跻江津”、“极泓量”、“流九派”、“鼓洪涛”、“沦余波”、“注五湖”、“灌三江”……直至“出信阳”、“淙大壑”,十分有力地表现出长江一路以雷霆万钧之力长驱奔突,冲破险阻,浩浩荡荡,最终流向大海,表现出一往无前、气冲云霄的浩瀚气魄。除此之外,在描写长江万里流程的同时,还有声有色、富于动感地描写了沿江的绝岸壁立、江湖漫漭、风雷流转、虹霄腾扬,从而使“洋洋大观”的长江形象更加丰富和富于立体感。

其次,通过描写江中和两岸欣欣向荣的无限风光,反映出给华夏大地带来蓬勃生机与活力的长江具有生生不息的强大的内在生命力和润泽千里的博大胸怀。

作者对于长江中不可胜数的物产的描写,再现了长江所孕育的广大生命世界。这个生命世界可谓林林总总,丰富繁盛,例如种类繁多的鱼类、稀奇怪异的生物、鼓翅争鸣的群鸟、绚烂葱茏的草木和各显神态的珍禽异兽等等,就连那冰冷沉寂的金石矿物,在作者笔下也充满了富于生命特征的光彩和温润。不止如此,岸上也是一片欣欣向荣。作者先描写江边渚、涧、渠、浦以及湖泊的形成,“因岐成渚,触涧开渠。漱壑生浦,区别作湖”,然后又描写江边的独特风光:

标之以翠翳,泛之以游菰。播匪芝之芒种,挺自然之嘉蔬。鳞被菱荷,攒布水蓂,翘茎藻蕊,濯颖散裹。随风猗萎,与波潭沲。流光潜映,景炎霞火。

这是长江水陆交错地带草木茂密葱郁的景象,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但草木种类繁多,而且各尽其态,各有特点:或高高标识,或水面漂浮,或密叶如鳞,或攒聚广覆,或水下伸展,或水上高翘,还有那浸水的花蕊、草穗和被风吹起到处散播的草籽……特别是当江风吹来,如火的红霞映照江水之际,生命活力的诗篇显得更加绚烂和壮丽!除了水陆交错地带,那被各种各样的花果草木荫庇着的长江两岸的漫山遍野,“繁蔚芳蕤,隐蔼水松。涯灌芊蕘,潜荟葱茏”,更为美丽广袤的山河增添了生命的光彩。

总之,无论是江中还是江上,也无论是水陆交错地带还是两岸高山原野,到处是一片繁荣茂盛的欣欣向荣景象,而那些不同生命各显神通的生存方式所形成的万类“竞自由”的场景,更是充溢着生命的不可抑制的郁勃之气。而这一切生命的奇迹和生机勃勃的美好景象,无一不是长江化生和哺育的结果,充分表现出长江润泽千里的博大胸怀。

除了以上两点,作者笔下长江的艺术形象还凸显了各种不同形态的美,特别是雄伟美、壮丽美、奇险美和流动美。

关于表现长江之美,在前面论述长江艺术形象的浑雄、壮阔、宏伟的艺术特征时,实际上已经涉及长江的雄伟美和壮丽美。这里再作进一步的说明。作者根据长江的固有特点,在对长江的具体描写中还突出了与长江有关的种种物象的无与伦比的巨大和席卷天地的威力:无论是穿越华夏

大地,还是连通浩瀚江湖;无论是万里长驱奔突,还是森茫朝宗于海;也无论是直插云霄的高山,还是纵横天地的大壑等等,莫不如此。而作者能够一览无余地将这些物象尽收眼底,与他的具有宇宙宏观特征的寥廓视角有直接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作者的胸怀和气魄。正是因为如此,这些物象的浩瀚气势才令人敬畏、折服并产生美感,同时使人心胸为之开阔,精神为之振奋,崇高感随之油然而生,并不由自主地发出惊叹和赞美。“巨大的自然对象,通过想像力唤起人的伦理道德的精神力量与之抗争,后者在心理上压倒前者、战胜前者而引起了愉快,这种愉快是对人自己的伦理道德的力量、尊严的胜利的喜悦和愉快。”^①而这种“喜悦”和“愉快”正是长江的雄伟美和壮丽美带给我们的审美享受。

除了雄伟美、壮丽美之外,本赋还表现了长江形象的另一种美:奇险美和流动美。这主要体现在对三峡的描写中:

若乃巴东之峡,夏后疏凿。绝岸万丈,壁立赳赳。虎牙巉竖以屹崿,荆门阙竦而磐礴。圆渊九回以悬腾,湓流雷响而电激。骇浪暴洒,惊波飞薄。迅湍增洄,涌湍叠跃。砢岩鼓作,崩渚洑潏……

这段文字先写三峡的悬崖峭壁:万丈绝壁矗立长江两岸,群峰高耸如虎牙交错,对岸荆门山险峻如城阙傲视,^②短短几句就突出了三峡长江两岸群山的根本特点。作者还着力从动态的视角刻画惊涛骇浪和流水的运动和变化。“圆渊”两句写三峡水流十分具体形象,《文选》注释者张铣曰“峡间江水深急,激岸石而成圆流,故云‘圆渊’也。‘九回’者,言深而至九泉,或悬浪而下,腾波而上,湓突击蹙如雷项之声,疾如电光之激。”^③除“九回”的解释有误外,^④其他解释还是符合原意的。对于流水和波浪则从动荡、起伏、回旋、汹涌、飞腾以及(水花)暴散等多种不同侧面展开描写,真实地再现了三峡流水状貌的多样性。对于流水和惊涛骇浪音响的描写也是如此:流水激石而“鼓作”,江涛湓涌而“雷响”,惊波飞涌,骇浪咆哮,音响的变化丰富而逼真。这说明,对于三峡不同景物的描写各有特点:悬崖峭壁状其“奇险”和“静”,惊涛骇浪状其“喧阗”和“动”。“奇险”与“喧阗”、“动”与“静”之间的自然结合,形成了一

个十分奇妙的时空境界。进入这个富于奇险美的艺术境界中,便会强烈感受到大自然奇妙而多变的性格及其所蕴含的巨大内在力量,并为此而深感惊惧和敬畏。

关于欣赏奇险美的心理感受和变化,康德早就作过比较具体的说明:面对悬崖峭壁、闪电雷鸣、狂涛汹涌、瀑布飞腾等等令人惊心动魄的现象,我们会感到恐惧和渺小,“但是假使发现我们自己却是在安全地带,那么,这景象越可怕,就越对我们有吸引力”。^⑤在安全的前提下,越可怕越有吸引力,正是奇险美的特点和魅力之所在。这是因为这种奇险美而动荡,在形式上呈现出严峻而冲突的特征,足以引起我们心理矛盾并为之震撼。

可以看出,作者通过多种不同的艺术手段,充分展示了长江的雄伟美、壮丽美、奇险美和流动美,而这诸多审美形态却具有共同的基本特征:都属于富有内在力量的阳刚之美。而这种美与前面论述的长江艺术形象所显示出来的精神气质恰恰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换言之,长江的精神气质正是通过具有阳刚之美的艺术形象而表现出来的。

综上所述,第一大部分通过长江网络群流、挟带万山、长驱奔突、冲破一切艰难险阻、穿越华夏大地、浩浩荡荡流向大海的壮阔历程,塑造了以阳刚之美为特色的长江完整的艺术形象,凸显了其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和卓越的精神气质,即一往无前、气吞万里的宏伟气魄,席卷天地、作限华夷的巨大威力以及润泽千里给华夏大地带来蓬勃生机与活力的博大胸怀。

在社稷倾危、半壁江山、民族生死存亡命悬一线的“最危险的时候”,作者如此满怀激情地讴歌长江、赞美长江,无疑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作为中华民族文明摇篮的黄河和长江,它们的精神气质实际上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和品格的象征,讴歌和赞美长江就是讴歌和赞美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性格、冲破一切艰难险阻的坚定意志和仁爱包容的博大精神。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江赋》真实而清晰地传达了视长江为生命线的东晋广大士臣的心声,反映了时代历史的要求。传诵和聆听这样的声音必将使人受到震撼,引起强烈的共鸣,从而使人们更加热爱长江、依恋长江,这对振奋民族精神、强化爱国热情、增强民族

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在东晋王朝内外交困的严峻形势下这个支柱尤其显得重要,有了它的支撑,对消解东晋士臣的悲观失望情绪、提振信心、鼓舞士气、恢复江山、洗刷民族耻辱都将增添无穷的力量。由此不难看出此赋的重大现实意义。‘璞著《江赋》,其辞甚伟,为世所称。’²⁴《江赋》的诞生可谓正当其时,受到人们的充分肯定绝非偶然。

三、作者的思想主张和对东晋君臣的希望

《江赋》的第二大部分篇幅虽然很短,但其中涉及到很多历史典故和道家思想等古代哲学问题以及一些含义比较复杂的词语,给理解造成不少困难。根据这种情况,本部分将结合疏解句、段之意,解释复杂词语,分析有关的历史典故和古代哲学问题进行论述。

作者对东晋君臣提出的希望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东晋皇帝司马睿的希望,一是对东晋士臣的希望,希望他们分别践行他的思想主张。

1. 对皇帝司马睿的希望,主要表现在如何为政和渡江北伐、恢复江山方面

关于如何为政,作者认为处理政事主要不是根据“符祥”,而应以天地关系为纲常、法度,同时根据世事变化灵活处理:

及其譎变儻恍,符祥非一。动应无方,感事而出。经纪天地,错综人术。妙不可尽之于言,事不可穷之于笔。

符祥,吉祥的符瑞,它的出现预示着吉祥顺利。从本质上看,符祥就是物占,即以物象作为善恶凶吉征兆、推究神的意志的术数,只不过“符祥”只是吉祥的征兆而已。这里提到“符祥”有具体所指。据《晋书·元帝纪》:建武元年司马睿即位,“乃备百官,立宗庙社稷于建康,时四方竞上符瑞……”²⁵历朝历代每当新帝即位,臣下为了取悦于皇帝,都会附会编造这类符瑞。虽然完全是虚妄的把戏,但皇帝却把它视为自己的统治符合天意的证明。这里作者特别提出符祥“动应无方”,它的出现具有偶然性,所以,为政的根本主要不能根据符祥,而在于“经纪天地,错综人术”。“经纪天地”中的“经纪”,即纲常、法度之意。《管子·版

法解》:“天地之位,有前有后,有左有右,圣人法之,以建经纪。”²⁶“经纪天地”即以天地的关系为纲常、法度。“错综人术”中的“错综”,为交错总聚之意。“错综人术”本“错综其数”而来,《周易·系辞》:“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²⁷句中的“数”指阴阳之数,大意思是说,交错总聚阴阳之数亦即阴阳之变,穷其变化就能把握天下万事、万物之理。赋中变“错综其数”为“错综人术”,人术即人为之术,也即为政之术。“错综人术”是说要交错总聚为政之术,通权达变,把握为政适时变化之理。

根据以上对有关词语的解释,这几句话的大致意思是:事物千变万化且十分迅速,而祥瑞征兆也彼此不同,随机出没,没有常规可以遵循。“符祥”的出现虽是吉祥的征兆,预示国祚隆盛、中兴有望,但它的出现具有偶然性,处理政事的根据不在“符祥”,而在于法天地,即以天地的关系为纲常、法度,并根据世事变化,把握时机,有针对性地灵活处理。这其中的玄妙道理是语言和文字无法完全表达清楚的。

再说希望皇帝司马睿渡江北伐、恢复江山,这主要是通过历史典故表现的:

想周穆之济师,驱八骏于鼉鼉。感交甫之丧珮,慙神使之婴罗。

这段文字涉及三个典故:

第一个典故“想周穆之济师,驱八骏于鼉鼉”是关于周穆王征伐的故事。《纪年》曰“周穆王三十七年,伐楚,大起九师,至于九江,驾鼉鼉以为梁。”²⁸作者以周穆王伐楚、鼉鼉为之架桥的历史传说,说明正义之师必得神助而获胜。

第二、三个典故“感交甫之丧珮,慙神使之婴罗”,是关于郑交甫以及神龟和宋元君的故事。前一个典故是说郑交甫求玉佩得而复失的故事,据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引鲁诗:郑交甫向江妃二女求佩,“二女……遂手解佩与交甫,交甫悦,受而怀之中当心。趋去数十步,视佩,空怀无佩;顾二女,忽然不见”。²⁹这个故事说明机会稍纵即逝,必须审时度势,把握时机。后一个典故出自《庄子·外物》,是关于神龟托梦给宋元君最终被杀的故事,说明处理政事应当“去小知而大知明”,³⁰即应当去掉小聪明,运用大智慧。³¹可以看

出,这两个典故说明的道理与前面所说如何为政的思想主张是完全一致的。

将以上两点结合起来看,就是希望皇帝为政不能逞一己之能,而应当以天地的关系为纲常、法度,运用大智慧,根据世事变化审时度势、把握时机,有针对性地灵活处理。这样就能像周穆王一样取得渡江北伐的胜利,最终实现中兴,恢复一统。

2. 对东晋广大士臣的希望,希望他们弘扬长江所孕育的崇高道德精神,“戮力王室,克复神州”

关于长江所孕育的崇高道德精神,是通过发生在长江上的四个历史典故表现的:^②

骇黄龙之负舟,识伯禹之仰嗟。壮荆飞之擒蛟,终成气乎太阿。悍要离之图庆,在中流而推戈。悲灵均之任石,叹渔父之棹歌。

第一个典故“骇黄龙之负舟,识伯禹之仰嗟”是关于大禹在江上折服黄龙使之“俛耳低尾而逝”^③的故事,出自《吕氏春秋·知分》。第二个典故“壮荆飞之擒蛟,终成气乎太阿”是关于荆国伙非战胜江神、以剑斩蛟的故事,出自《越绝书》。这两个典故所表现的大禹和伙非的崇高道德精神,《吕氏春秋·知分》以“达士”予以评价“达士者,达乎死生之分。达乎死生之分,则利害存亡弗能惑矣。”^④充分肯定了他们不苟活、不贪利害义的道德品格和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精神。

第三个典故“悍要离之图庆,在中流而推戈”是关于要离为吴公子光谋杀庆忌失败后而自尽的故事,出自《吕氏春秋·忠廉》。《吕氏春秋》还就此事论及士应当如何对待“辱”的问题“士议之不可辱者大也,大之则尊于富贵也,利不足以虞其意矣。虽名为诸侯,实为万乘,不足以挺其心矣。”^⑤认为对于一个士人来说,不受辱,保持尊严,比富贵、权势更为重要;只要有了这种精神,为了国家和民族大义,就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第四个典故“悲灵均之任石,叹渔父之棹歌”是关于屈原投江殉国的故事,充分肯定了屈原的“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的崇高精神和品德。^⑥

以上四个典故充分表现了大禹、伙非、要离和屈原等忠臣义士的忠贞高洁、刚正不阿、视死如

归、宁可殉节而死也绝不苟活的士不可辱的精神。作者如此热情地讴歌忠臣义士,十分明显,就是希望东晋广大士臣继承和弘扬长江所孕育的这种崇高道德精神(详后)。

如果联系《江赋》产生的历史背景,可以清楚看出作者所提出的这些思想主张具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和目的性。例如,作者讴歌忠贞高洁、刚正不阿、视死如归和不可辱的崇高道德精神,是因为当时东晋广大士臣缺乏的正是这种道德精神,因此继承和弘扬这种崇高道德精神,戮力报国、振兴王朝也就成为当务之急。而写如何为政和周穆王渡江征伐的典故,则是希望当朝皇帝司马睿“经纪天地,错综人术”,勤于国事,振兴王朝。总之,作者认为无论是东晋的国君还是士臣,都应当振奋精神,有所作为,如此君臣上下同心、和衷共济,那么渡江北伐、驱除异族、洗刷民族耻辱必将指日可待。

应当指出的是,在作者提出的思想主张中,特别强调发扬士不可辱的精神,更是有其迫切的现实意义。因为在异族入侵、山河破碎的背景下,作者心目中的“辱”,主要不是指个人人格所受的小辱,而是指“永嘉之乱”中民族尊严和文化传统以及生命财产受到重创和侵犯的奇耻大辱。关于作者话语中“辱”的这一特定含义,可以从他作得到有力证明。作者在《与王使君诗》中对异族入侵给中原地区造成的空前历史劫难这样写道“遭蒙之吝,在我幽人。绝志云肆,如彼涸鳞。”吝,耻辱“遭蒙之吝”即指永嘉之乱中民族遭受的奇耻大辱。后两句是说,永嘉之乱,异族入侵,人们决心离开家乡犹如云散;生活困苦不堪,如同涸中之鱼陷入了绝境。^⑦由此不难看出,作者在本赋中特别强调士不可辱的精神确是“别有用心”,即强调不要忘记异族入侵之辱,并以“戮力王室,克复神州”的实际行动来彻底洗刷全民族的这一奇耻大辱。

四、结构安排的“得”与“失”

按照《江赋》题目命意的要求,第一大部分通过多侧面的形象描写成功塑造了长江的神形兼备富于阳刚之美的艺术形象,内容已经相对完整,对于以形象反映生活、抒发情怀的文学作品来说,这

当然就意味着基本完成了任务,可以就此告结。但是,作者没有这样做,而是调转笔锋继续抒写另一内容:为使东晋王朝摆脱内外交困的窘境而提出了一系列希望东晋君臣践行的思想主张。这一部分所涉及的哲学思想、道德精神、政治主张和治国方略等无一例外都属于政治、哲学、道德精神范畴,与前一部分所涉及的悬崖峭壁、惊涛骇浪、日月星辰、风雷流转等等自然景观没有任何形象上的直接联系。从篇幅上看,作者提出的思想主张虽然只有前一部分的1/6,但在内容上却是完全独立的。如此结构安排,十分自然地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在描写和讴歌长江的体物大赋中为什么要续接作者的思想主张,并以这样一段内容收尾?这样的结构安排,其“得”、“失”如何?显然,这是正确认识和评价《江赋》必须正确回答的问题。

先说这样结构安排的原因,即在塑造了长江的艺术形象之后为什么还要阐述自己的思想主张?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

第一,决定于东晋王朝内外交困的严峻形势和作者心系天下、匡时济世的襟怀。

前面说过,在社稷倾覆、江山残破、全民逃亡的危急情况下仓促建立起来的东晋王朝,外有胡马临江的严重威胁,内部国力衰微、朝纲不振、士臣悲观失望、人心涣散,随时都有覆灭的危险。在这民族存亡、社稷安危命悬一线的紧急历史关头,一切有志于抗敌救国的有识之士,都迫切认识到根据纲常、法度和世事变化,审时度势、把握时机处理政事以及弘扬崇高道德精神以提振信心、鼓舞士气的极端重要性。郭璞作为“过江诸人”之一,在“避地东南”途中由于饱受这场历史大劫难的煎熬和折磨,使他对东晋王朝所面临的巨大威胁和严峻形势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因而也就更加认识到践行这些思想主张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郭璞入朝以后,凭借他敏感的政治嗅觉,面对内外交困的危急局面,更增加了他的危机感。“陛下即位以来,中兴之化未阐,虽躬综万机,劳逾日昃,玄泽未加于群生,声教未被乎宇宙,臣主未宁于上,黔细未辑于下,《鸿雁》之咏不兴,康哉之歌不作者……”^③为此,他曾“数言便宜,多所匡益”,^④在《省刑疏》、《因天变上疏》中针对朝政弊端和影响国家长治久安、百姓安居乐业的严重问

题提出不少谏议和匡正措施。这些奏疏不仅辞情恳切,而且直击要害,充分反映了郭璞心系天下、匡时济世的襟怀和对于晋王朝的拳拳之忠。

正是对于东晋王朝所面临的严峻形势的深刻认识和强烈的危机感以及对于东晋王朝和民族历史命运的关注,才使他在热烈讴歌作为东晋王朝生命线的长江的大赋中,提出了件件都切实点中了东晋王朝虚弱病体穴位的思想主张,并辞情恳切,希望东晋君臣践行。

第二,与汉代大赋结构特点的影响有关。

如果联系汉代以来的辞赋发展史,即可知道《江赋》在塑造长江的艺术形象之后,又针对时局阐述其思想主张的结构安排有其深刻的渊源。我们知道,汉赋在铺张排比、靡丽夸饰的描写之后,往往还要加上一个体现其写作主旨的所谓“讽喻”。关于这种结构安排和写法形成的历史,《后汉书》作者在论述班固《两都赋》时有一段简要说明:班固“感前世相如、寿王、东方之徒,造构文辞,终以讽劝,乃上《两都赋》,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⑤事实上,为大赋安上“讽喻”尾巴的除上述辞赋家外,其他大家,如同样以辞赋闻名且广有影响的扬雄、张衡等也是如此。扬雄《羽猎赋》讽“苑囿之丽,游猎之靡”,^⑥张衡《西京赋》讽“以靡丽为国华,独俭啬以龌龊”^⑦等等。看来,“造构文辞,终以讽劝”的写法在两汉时代就已经成为大赋结构的固定模式。十分明显,《江赋》的结构安排,即在铺写长江的艺术形象之后为凸显其创作主旨,特别以一个段落阐述其思想主张,与汉代大赋的传统结构模式具有某些相似性。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不应当只看到这种相似性,更为重要的是看到它们之间存在的明显不同。一般说来,汉代大赋的讽喻不但十分简单,而且言不由衷,空洞泛泛,以致“劝百讽一”,讽喻完全流于形式。对于这一点人们早就有看法,例如张衡对他的前辈就提出过这样的批评“故相如壮《上林》之观,扬雄骋《羽猎》之辞,虽系以溃墙填堑,乱以收置解罟,卒无补于风规,祇以昭其愆尤。”^⑧与汉代大赋相比,郭璞在《江赋》的最后所提出的思想主张则完全不同。无论是对皇帝司马睿的中肯谏议,还是对广大士臣的谆谆告诫,对于处于内外交困的东晋王朝来说,都是令人警醒、催人奋进的

良药,其效用和影响为大赋中流于形式的“讽喻”所望尘莫及。此外,通过这些主张,还能看出作者以天下为己任的忠贞情怀和把握形势、洞察世情人心的睿智。

总而言之,《江赋》的结构安排虽然借鉴了汉代大赋的“造构文辞,终以讽劝”的写法,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与大赋中“讽喻”的苍白无力的刻板说教相比,郭璞的思想主张则充满了真知灼见,因此,可以说这些思想主张不是“讽喻”而胜似“讽喻”。

以上简要说明了《江赋》最后阐述其思想主张的原因,那么,从文学作品艺术整体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结构安排,又应当如何评价呢?

简言之,对《江赋》来说,这样的结构安排可谓有得有失。

如前所说,作品最后所提出的思想主张,其目的一方面在于劝谏皇帝强化纲常、法度,把握时机,积极妥善处理政事;另一方面在于呼唤东晋士臣彻底荡除弥漫于东晋社会的悲观失望、不思进取的消极情绪,也就是从政治思想和道德精神方面彻底清除抗敌救国的最大障碍。而这些内容与作品的前一部分所塑造的以阳刚之美为特色的长江浑雄、壮阔、宏伟的艺术形象,其意都在振奋精神,鼓舞士气,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以达到戮力报国、完成渡江北伐、恢复中原的崇高目的。就是说,前后两部分之间在基本精神和思想意义方面具有某些内在的一致性。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些思想主张不只凸显了其创作意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思想,强化了作品的现实意义。

以上是所谓的“得”。再说“失”。作者阐述的思想主张属于议论,一般说来,文学作品并不排斥议论,但文学作品中的议论毕竟不是政治宣言和策论纲领,其思想内容、表述方式乃至语言特征等等与其他部分之间在艺术形式上必须达到有机统一,共同构成具有审美特征的艺术形象,才能焕发艺术魅力,从而感染人打动人,真正达到写作目的。如前所说,在《江赋》的两部分内容之间虽有思想上的联系,但也仅仅是某些联系而已,与两者之间的有机统一还有一定的距离。例如,为了说明“经纪天地,错综人术”的为政之术和伦理道德问题,不但用了很多历史典故(其中有些是比较

生僻的),而且还以关于道家思想的高度抽象哲学概念进行枯燥的说教。这些与前一部分对长江的充满激情的讴歌和赞美及其所表现的对长江的热爱和依恋,无论在思想感情上还是在性质特点上都形成了明显的反差,使人有割裂之感。

众所周知,汉代大赋中存在的普遍问题之一就是形象的铺陈描写与讽喻之间难以达到有机的统一,看来,在结构安排上借鉴大赋而创作的《江赋》也未能完全避免这一弊端而留下了历史性的缺憾。虽然如此,如果考虑到两者性质的差别和完全不同的时代历史背景,我们就不能将《江赋》最后部分中的“概念化”、“实用化”说教与汉代大赋中的“无贵风轨,莫益劝诫”^④的“讽喻”等量齐观。

注释:

- ①关于西晋末期人口迁徙的情况可参阅陈寅恪《晋代人口的流动及其影响》,见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版,第114-129页。
- ②《晋书·王导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六册第1746页。
- ③《资治通鉴·怀帝永嘉五年》,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2册第2766页。
- ④唐长孺《王敦之乱与所谓刻碎之政》,见《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1页。
- ⑤陈寅恪《南北对立形势分析》,见《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226页。
- ⑥《晋书·石季龙载记上》,第九册第2763页。
- ⑦《晋书·元帝纪》,第一册第149页。
- ⑧《晋书·王导传》,第六册第1747页。
- ⑨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册第80页。
- ⑩《晋书·郭璞传》,第六册第1899页。
- ⑪参阅赵沛霖《一首富于时代特征和人生悲情的颂歌——关于〈与王使君诗〉》。
- ⑫《晋书·郭璞传》,第六册第1909页。
- ⑬《晋书·王导传》,第六册第1745页。
- ⑭同上,第六册第1746页。
- ⑮参阅同上,第六册第1745-1746页。
- ⑯杨勇《世说新语校笺》,第1册第80页。
- ⑰事实上以长江为主,还有其他江河。
- ⑱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2页。
- ⑲句中的虎牙和荆门既是山名,也是状写山貌,参阅《文选》李善对这两句的注释,见《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84页。
- ⑳《六臣注文选》,中华书局,1987年版,上册第238页。
- ㉑“九回”是反复回旋之意。
- ㉒康德《判断力批判》,宗白华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上卷

第 96 页。

②③《晋书·郭璞传》，第六册第 1901 页。

②④《晋书·元帝纪》，第一册第 145 页。

②⑤《管子·版法解》：“天地之位，有前有后，有左有右，圣人法之，以建经纪。”见《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54 年版，第 5 册第 339 页。

②⑥《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中华书局，1980 年版，上册第 81 页。

②⑦《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版，第 49 页。

②⑧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中华书局，1987 年版，上册第 51 页。

②⑨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 年版，下册第 934 页。

②⑩关于孔子对于这个故事的评论，请参阅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对孔子评论的译文，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 717 页。

②⑪关于长江孕育了这种崇高的道德精神，作者还从哲学方面作了说明，如“焕大块之流形，混万尽于一科。保不亏而永固，稟元

气于灵和。考川渚而妙观，实莫著于江河”。具体分析详另文。

②⑫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 年版，第 3 册第 1346 页。

②⑬同上，第 3 册第 1345 页。

②⑭同上，第 2 册第 587 页。

②⑮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 48 页。

②⑯参阅赵沛霖《一首富于时代特征和人生悲情的颂歌——关于郭璞〈与王使君诗〉》。

②⑰《晋书·郭璞传》，第六册第 1903 页。

②⑱同上，第六册第 1904 页。

②⑲《后汉书·班固传》，中华书局，1965 年版，第 5 册第 1335 页。

②⑳扬雄《羽猎赋》，见《文选》，第 135 页。

㉑张衡《西京赋》，见《文选》，第 50 页。

㉒张衡《东京赋》，见《文选》，第 67 页。

㉓见《文心雕龙·诠赋》。

The First North – South Confrontation in Chinese History and Guo Pu's *Poems on the Yangtze River*

ZHAO Peilin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Tianj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ianjin 300191,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Western Jin and Eastern Jin Dynasties, the first North – South confrontation in Chinese history appeared, and at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period, the Yangtze River, the lifeline of Eastern Jin Dynasty, became the source of literary creation of poets. Guo Pu's *Poems on the Yangtze River* was a typical example, which not only vividly molded the artistic image of the Yangtze River, but also was characterized with uniquely spiritual temperament of the times. On the brink of the downfall of Eastern Jin Dynasty, Guo Pu's *Poems on the Yangtze River* eulogized and appreciated the Yangtze River, and expressed his political ideas and ambition as well. Guo Pu's poems were inevitably significant to strengthen national solidarity and revitalize the national spirit of Eastern Jin Dynasty.

Key words: Guo Pu, *Poems on the Yangtze River*, the Yangtze River, the period of Western Jin and Eastern Jin Dynasties, North – South confrontation

(责任编辑: 吴 澄)